

隨筆

2018中国年度随笔

徐南铁 主编

漓江年选。品质阅读。恒久珍藏

谢泳《陈寅恪、岑仲勉关系小考》

何英《天使的堕落与拯救》

梁文道《怀念我的老校长》

郑经民《情系敦仁里》

吴昕孺《一为迁客去长沙》

杨克《我说出了风的形状》

晓秋《另一种相遇》

肖伊绯《胡适与南加州大学》

崔济哲《戏外》

如箏《历史真相是如何浮现的》

漓江出版社

漓江年选 ◯ 品质阅读 ◯ 恒久珍藏

2018中国年度随笔

徐南铁 主编

漓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18 中国年度随笔 / 徐南铁主编.

—桂林: 漓江出版社, 2019.3

ISBN 978-7-5407-8658-8

I. ①2… II. ①徐…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18204号

2018 ZHONGGUO NIANDU SUIBI

2018 中国年度随笔

徐南铁 主编

出版人: 刘迪才

出品人: 张谦

策划编辑: 沈东子

责任编辑: 谢青芸

书籍设计: 石绍康

责任监印: 张璐

漓江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22号 邮政编码: 541002

发行电话: 010-85893190 0773-2583322

传真: 010-85890870-814 0773-2582200

邮购热线: 0773-2583322

电子信箱: ljcs@163.com

网址: <http://www.lijiangbook.com>

香河县闻泰印刷包装有限公司印刷

[河北省廊坊市香河县安平镇二街 邮政编码: 065402]

开本: 690mm×1000mm 1/16

印张: 19.5 字数: 267千字

2019年3月第1版 2019年3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407-8658-8

定价: 45.00元

漓江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漓江版图书: 如有印装问题, 可随时与工厂调换

代序：选编是文化立场的显示

徐南铁

漓江年选出版 20 周年，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开讨论会的时候，院子里的石榴绿叶落尽，硕大的红果在灰黄的枝条中格外显目，或许与我们的话题有关，有所象征。

在浩如烟海的文章中选取篇目编书，看似大海中取数瓢饮，以为编者必然是信手拈来，游刃有余。其实，选编同其他图书一样受市场限制，受读者的影响，还有这样那样的掣肘，不可能不注意到社会的文化心理。

选编这种形式，其本身就是社会文化需求的产物。20 世纪末，曾有过一个报刊数量大增长、大发展的阶段，为了适应知识的爆炸性增长，满足社会阅读的需求，许多文摘类报刊应运而生。在城市文化的勃兴浪潮中，不少知识性、趣味性、休闲性的文摘报刊大行其道。但是大浪淘沙，那些蜂拥而起的文摘报刊虽然有的至今仍保持着影响，大多数却逐渐式微。它们既是社会文化需求的产物，也是社会文化选择的结果。这种状态，正是社会和时代检验、影响并推动着选编者的结果。

作为连续性的年度选本，如果严重背离了社会需求，必然行之不远，难以为继。像漓江出版社这样，20 年前就开始经营年度选本，坚持不懈，而且一直保持较高水平，殊不容易。更可贵的是，通过 20 年的努力，该社各种文体的选本日臻齐备，组成了系列品牌的一个方阵，形成了很大影响。

漓江出版社年选书系的成功，不但证明了选题目光的高远以及策划定位的

准确，同时也证明了选编的水平。在纸质媒体受到极严峻挑战的今天，这种文化的守望将在历史上留下深深脚印。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图书的选编工作在尽力满足社会文化需求的同时，更是选编者文化立场的显示。

看上去，文章选编附丽于其他的书报刊，只是在做搬运工，做二度编辑工作，在别人圈定的世界里采撷花朵，似乎没有多大的创造性。但是在挑选文章和组合成书的过程中，选编者的思想、文化和审美并未缺席，而是悄然展示了自己的慧眼独具，看似不露痕迹地由此展示自己的文化立场。每一篇文章的挑选理由，都是选编者的表态，是对文本、作者以及文章首发媒体的肯定。

我认为，文章的流布和影响不应是我们的选编特别看重的因子，就拿随笔的选本来说，思想的深度厚度、情感的含蕴流泻、审美的张力维度，才是我们真正要关注的对象。流行的未必是真正的杰作，而且，如果每一家的选本都围绕着社会聚光灯下那一小块地方，我们的选编也就失去了个性和意义。

我们不可能把年度选本定位于《昭明文选》式的时代总结高度，也不必赋予它“野无遗贤”的责任。它可以是百花园里的选粹，也可以是视野边缘的有益补充，甚至可以是阴云遮掩下的某种提醒。文字是别人的，内涵却已经化为选编者已有，已经是选编者内心和素养的表达。

我认为只有这样去看待和理解选本，才能实现选编的文化意义。

原载微信公众号“粤海述评”2017年12月28日

目 录

contents

001 / 代序：选编是文化立场的显示 徐南铁

言 说

003 / 民国元首，从谁说起？——为黎元洪说句话 李新宇

012 / 陈寅恪、岑仲勉关系小考 谢 泳

020 / 人类人性改善是否可能？ 高兆明

025 / 校友是母校的一座“金矿” 刘道玉

030 / 科幻的人 王威廉

035 / 文体家、文学家与美文家 朱中原

045 / 鲁迅凭什么坐上现代文学第一把交椅 商昌宝

051 / “二王”书风泛滥是当代书坛最大的迷失 郑荣明

058 / 认识你自己 朱国华

061 / 天使的堕落与拯救 何 英

人 生

069 / 怀念我的老校长 梁文道

078 / 物理学家束星北的孤独	许水涛
085 / 弄潮儿向涛头立——我眼中的雷达先生	赵 勇
094 / 情系敦仁里	郑经民
101 / 一为迁客去长沙	吴昕孺
110 / 你到底重要不重要?	瓜 田
115 / 怀念陈新先生	漆永祥
126 / 林语堂, 阳明山上的生活家	马 犇
131 / 暗香浮动的广州	东方莎莎
136 / 人生何处不纵酒	朱金海

情 怀

145 / 启功大师说“不”的艺术	[美] 俞 宁
155 / 《苦路人影》，打捞记忆之影	孙 郁
158 / 我和我的母亲	徐新霞
165 / 我说出了风的形状	杨 克
171 / 神茶清水武夷山	蒋 泥
183 / “寻找”卡拉扬	杨学武
191 / 路过七十三区夜市	王国华
200 / 泰山行，见“哀愚”	王 瑛
203 / 另一种相遇	晓 秋
208 / 水墨繁华	苏雪依

世 事

213 / 余美颜的上海行	周松芳
---------------	-----

	225 / 乡村风景	毕星星
	236 / 胡适与南加州大学	肖伊绯
245 / 从陆羽《茶经》到朱权《茶谱》的世风流转		林 硕
	251 / 戏 外	崔济哲
	260 / 我见过的贾植芳先生	李林荣
263 / 东纵北撤：万众瞩目的旅途——《东江纵队北撤日记》前言		曾庆榴
	268 / 历史真相是如何浮现的	如 箏
	275 / 有关作家的闲聊小记	周 实
294 / 在一个地方待久了，人也就生出了根须		黄 荭
	297 / 代跋：随笔的定义	顾 农

？ 言 说



【主编者言】关于历史的叙说，总不免缠绕不清。因为历史总是由胜利者书写，必然留下胜利者的喜好之痕。所以，即使是历史的细节，能够梳理清楚言之大众，也值得欣喜。

民国元首，从谁说起？

——为黎元洪说句话

李新宇

我写过一篇《开国都督黎元洪》，是为“床下都督”之类的说法辩污的。其实，关于黎元洪，还有一事值得澄清：他事实上是“中华民国”的第一任元首。

史实本来一目了然，只因为国民党人建立自己的统治之后改写辛亥革命的历史，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的领袖，而另一些人就被遮蔽了。之所以要改写历史，原因是辛亥革命发生之后，同盟会的领袖们不愿承认眼前的事实：革命发生了，却与他们无关。他们多年致力于革命，而且摆开了领导全国的架势，但革命发生了，却与他们无关——他们的人既不在场，也不知情。黎元洪成了革命首领，成了与大清帝国交战方的领袖，这让他们非常沮丧。为了争夺革命的领导权，他们想了许多办法，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掌握政权之后所做的，就是争夺史书上的领导权。然而，史实是不应该被党派的史书掩盖的。

一、“武汉军政府”与“中华民国军政府”

革命的第二天，10月11日下午，武昌成立了军政府。这个军政府在后来的叙述中一直被称作“武汉军政府”“湖北军政府”或“鄂军都督府”，强调它

的地方性。但这个政府的性质却值得深入考察。虽然革命第二天在武昌以黎元洪名义贴出的布告冠以“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黎”，但那是同盟会的人从日本带回的布告。在讨论革命之后的政权名称时，刚从狱中出来的同盟会会员胡瑛强调要按同盟会的规定，起义成功后建立的政权必须是“中华民国军政府某地都督府”，但武昌的革命本来就与同盟会关系不大，人们是否接受了这一规定，却是一个疑问。从历史留下的材料看，固然有冠以“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的文件，却也有冠以“中华民国军政府”的文件。武昌军政府办的报纸是《中华民国公报》，出台的第一份条例是《中华民国军政府暂行条例》，而且武昌军政府有一枚大印，刻的是“中华民国军政府之印”^①。南北和谈开始之前，黎元洪照会伍廷芳，要他“迅速首途来鄂，以便对待一切”，称他为“临时政府外务总长”，照会所用的印章则是“中华民国中央军政府大都督之印”……当时的许多文件证明，不仅中华民国中央军政府已经存在，而且常被称作“临时政府”，到伍廷芳作为南方总代表参加和谈，他的身份已经是“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外务总长”^②。

军政府成立之后的第四天，10月14日，即起草了《中华民国军政府暂行条例》，并于17日公布。也就是说，革命之后成立的军政府本是中央军政府。然而，随着革命成功后在押同盟会成员的出狱和各地同盟会成员的纷纷奔赴武昌，到10月25日，一份《中华民国鄂军政府改订暂行条例》出台，不仅把军政府原先的4个部改为9个部，增加了一些同盟会出身的部长，而且把“中华民国军政府”的暂行条例改为“中华民国鄂军政府”的暂行条例。

国民党人开创的辛亥革命史叙述到这里，常常要讲立宪派篡夺政权的“险恶用心”。直到今天，一些著作仍然是这样写的：“条例冠以‘中华民国军政府’，把湖北军政府升格为中央政府，暴露了汤化龙等人获取全国政权的用心。”^③

① 《辛亥革命资料丛刊》第五册正文前之图片。

② 《辛亥革命资料丛刊》第五册，第70页。

③ 贺觉非、冯天瑜：《辛亥武昌首义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27页。

对于把“中华民国军政府”降格为“鄂军政府”，黎元洪倒是不在乎，从当时到后来，都没有任何表示。可是，谁规定首义成功之后就只能建立地方政府而不能建立中央政府？事实上，那不过是同盟会内部的规定：凡同盟会成员，无论谁，无论在哪里起义，成功之后都只能建立地方军政府，即“中华民国军政府某省某地都督府”，而不能建立“中华民国军政府”。之所以这样规定，为的是把“中华民国军政府”留给同盟会的领袖孙文或黄兴等人。这在组织内部，或许有它的道理，但黎元洪并非同盟会成员，汤化龙等也不是，筹划和领导了辛亥革命的文学社、共进会都不隶属同盟会，有什么理由一定要按照孙文在海外的规定把“中华民国军政府”的位子留给同盟会领袖呢？

在同盟会成员中，最先到达武昌的是谭人凤、居正二人。他们从上海出发时还不知道武昌发生革命，“到九江，黎元洪为都督之名义，已喧嚣于耳鼓矣”^①。当他们于10月14日到达武昌时，已是黎元洪做都督的第四天，不仅国内各地已响遍黎元洪大名，而且海外报纸也已在报道这位中国革命的领袖。面对这种情况，谭人凤和居正非常扫兴。他们是来领导革命的，但来晚了。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于当夜11点在农务学堂召开同盟会党人会议，商量对策。居正在会上讲话说，他明天将返回上海，请黄兴、宋教仁前来武昌主持大计。谭人凤后来写道：“黎元洪一无用庸劣懦夫也。武昌革命以统率无人，拥为都督，旋为副总统，旋而大总统，居然命世之英。……推原祸始，则皆宋钝初之迁延有以致之也。不然，当时内地同志，对于海外来者实有一种迷信心，安有黎元洪？”^②

他们考虑更多的，不是帝制如何终结，共和如何实现，而是权力归于谁手。

武昌起义成功的消息传开，各路革命党人马上纷纷行动起来。海外的纷纷回国，国内的纷纷往武昌聚集。本来素不相识，素无联系，只因为大家都曾致力于推翻清朝，便都投奔首先革命胜利的武昌来了。不过，奔赴武昌的人群，

① 谭人凤：《谭人凤自述》，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年，第70页。

② 谭人凤：《谭人凤自述》，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年，第71页。

却往往各有自己的打算，有人是来支援革命，带了军队到达武昌，马上向黎元洪报到，接受任务之后即带人马驻守或攻打去了。然而，也有一些人，尤其那些革命组织的领袖，到武昌来，却各自怀了不同的心思。

辛亥革命爆发18天之后，10月28日，黄兴和宋教仁带了上百号人，前呼后拥抵达武昌——他们是来领导革命的。他们到来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四处活动，准备推举黄兴做“两湖都督”。这是宋教仁与黄兴在从上海到武昌的船上筹划好的。此时的湖北都督是黎元洪，湖南都督是焦达峰，由黄兴出任“两湖都督”，也就是凌驾于黎、焦之上，让湖北都督和湖南都督都成为黄兴的下属。宋教仁之所以有如此设计，口头上虽是为革命事业着想，协调两湖行动，但明眼人不难看出，真实用心不过是为同盟会争夺最高领导权。同盟会的领袖们此时共同的心病就是他们多年奔走革命而一无成功，而武昌的文学社和共进会却一举取得了革命的成功；他们以为自己是革命多年的革命领袖，却没想到他们的革命成功了，实际的革命领袖成了黎元洪。他们在领导中国革命的梦幻中已经沉浸太久，无法接受革命发生了却不归他们领导的现实。

然而，这次宋教仁等犯了一个错误：过高地估计了他们个人以及同盟会的影响力。武昌的革命者大多是文学社和共进会的成员，与同盟会或中部同盟会没有关系，如果是蓝天蔚或吴禄贞回来，他们也许会接受他们的领导，但对黄兴和宋教仁，他们却不买账。之所以如此，我们只要查一查当时都督府的成员，查一查当时武昌起义时那些领导人的党籍，就可以看到，里面没有多少人参加过同盟会；有的参加过，却已经改入共进会。当时的武昌诸将信任黎元洪，拥戴黎元洪，所以，当这群来自上海的同盟会领袖的提议一出，马上遭到了反对。

争夺最高领导权的梦想成了泡影，自然非常扫兴。黄兴能忍让，审时度势，调整姿态，接受黎元洪的任命，做了前线的总司令。而宋教仁转身去做立法工作，成就了一部《鄂州约法》。《鄂州约法》是一部辉煌的法典，显示着宋教仁为革命后的宪政建设立下的不朽功勋；但考察这部法典从讨论到形成的过程，却不难看到宋教仁出于党派立场的一些小算计。

革命成功了，需要立法，要创建什么样的国体和政体？要建立什么样的国家？这是人们不能不关心的。受命立法的人们首先提出和讨论的是“共和国体”“民主政体”“立宪政治”“责任内阁”“政党议员”“人民权利”之类的问题。约法如果写入这些条款，就是为新的国家立法。然而，宋教仁最后拿出的文本，却不是《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而是《中华民国鄂州约法》，为此，他甚至不惜割舍关于国体、政体和他所热心的立宪政治和责任内阁，让它们在约法中不见了踪迹。之所以这样，用心只有一个：把黎元洪和武昌政权限定为地方政权。

然而，当时的国人却并不把武昌政权看作地方政权，而是把它看作一个新的中央政权；也不把黎元洪看作地方性的人物，而是把他看作一个新时代的领袖。杨铎在《辛亥建国史纲》曾经写下这样一段话：“吾尝戏论，以为孙武、居正者，陈胜、吴广也；黎元洪者，似汉高耳。人造其因，伊受其果，岂非天命哉！”^①当时的许多人，都不把黎元洪看作一省都督，而是把他看作全国革命的领袖。正如做过南京临时参议院秘书长的林长民在《参议院一年史》中所说：“各省独立，无所统一，黎元洪因首义负时望，众论咸推戴之。”^②即使是宋教仁，虽然一方面谨慎地防范黎元洪占据全国领袖的位置，另一方面也无法回避眼前的现实。所以，在《中华民国鄂州约法》的第一条条款中，就不得不写下：“将来取得之土地，在鄂州域内者，同受鄂州政府之统治，若在他州域内者，亦暂受鄂州政府之统治，俟中华民国成立时，另定区划。”这也就是说，在中华民国正式成立之前，鄂州政府有统辖全国的权力。

二、元首地位的确立

接下来是各省纷纷独立，革命阵营急需统一的领导机构。11月7日，武昌

① 杨铎：《辛亥建国史纲》，载于《辛亥革命稀见史料汇编》，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7年5月，第99页。

② 《辛亥革命资料丛刊》第八册，第555页。

向独立各省发出电报，就组织中央政府事宜征求意见。电报说得很客气：“现今义军四起，大局略定，唯未建设政府，各国不能认交战团体。敝处再四筹度，如已起义各省共同组织政府，势近于偏安，且尚多阻滞之处；若各省分建政府，外国不能于一国之内承认无数之交战团体。兹事关系全国甚大，如何之处，乞贵军政府赐教。”两天之后，11月9日，黎元洪再次发出电报，正式邀请独立各省派代表来武昌商讨筹建临时政府。电文中说：

大局粗定，非组织临时政府，内政外交均无主体，极为可危。前电请速派委员，会议组织，谅达尊鉴。唯各省全权委员，一时未能全到，拟变通办法，先由各省电举各部政务长，择其得多数票者来鄂，以政府成立照会各国领事，转各公使请各本国承认，庶国基可以粗定。敝省拟中央临时政府暂分七部：一、内务，二、外交，三、教育，四、财政，五、交通，六、军政，七、司法。其首长之条件，以声望素著，中外咸知，并能出而任务为必要。盖非此不足以昭各国之信用也。现除外交首长多数省份已举伍廷芳、温宗尧二君外，其余各首长应请协举电知敝省，候汇齐后其得多数当选者，一面电聘，一面通告。时事紧急，希即会议决定。再，财政首长敝省拟举张謇。

这份电报透露着各种信息，尤其明显的是，黎元洪没有把目光局限在武昌，而是放眼全国，在全国范围内考虑各部的合适人选。这是辛亥革命的一个伟大之处，革命之后，不是参与革命者论功行赏瓜分权力，而是在全国范围内选贤举能执掌权力。

黎元洪的电报发出四天之后，11月13日，沪军都督陈其美联合江苏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汤寿潜通电各省，请派代表到上海开会，准备设立“临时会议机关”，并筹建临时政府。

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迹象。黎元洪的第一份电报发出已经6天，第二份电报发出也已4天，上海方面却置之不理，自己发出了邀请代表到上海组建政府

的电报。后来，上海方面的解释是因为线路故障，没有及时收到湖北的电报。

上海集团的核心人物是同盟会的陈其美，此外还有宋教仁等一帮中部同盟会的领袖。如前所述，“武昌起义前，湖北革命党人推居正、杨玉如赴沪催促黄兴、宋教仁来武汉，目的就是要他们来领导起义，然后以‘起义之首领’的资格，出任都督”^①。然而，革命爆发了，而且成功了，同盟会的领袖们却未能赶到，错失领导革命的机会。同盟会的一些人不甘心让革命主导权落入别人手中，因而进行了种种努力，可是，除了阻挠革命后的武昌政权成为新的中央政权之外，使黎元洪和独立各省隶属于他们麾下的计划却没有成功。这让同盟会领袖们非常窝火。正因为这样，他们很快从武昌撤离，去实行宋教仁的新计划：“率南京新军夺江南诸省以制天下。”目的仍然是防止黎元洪以首义都督的声望向全国发号施令。所以，当上海为支援武汉而召集起队伍之后，他们没有让队伍驰援武汉，而是在上海就地起义，然后促使江苏和浙江独立。浙江刚刚独立，陈其美即联络汤寿潜和程德全发出召集会议的电报。这时候，南京胜负未定。

陈其美等人的这一举动，显然带有山头的考虑，不希望以黎元洪为中心组建中央政府。不过，上海集团并非无所顾忌，因为武昌首义天下共知，黎元洪已占先机。上海如果另举旗帜，显然很难服人。所以，陈其美等人在上海建立中央政府的设想并无把握，不过是投石探路。而且，上海集团的想法也并不一致。作为同盟会成员的陈其美想的，与作为旧巡抚程德全想的，与立宪派领袖张謇、汤寿潜等人想的，其实相距甚远。

所以，就在陈其美等人发出邀请之后，张謇等人有了“请求各省都督府承认武昌为中华民国新政府”倡议^②。状元张謇更清楚地知道，在中国历史上，激烈的战争往往并不发生在推倒旧王朝之际，而是发生在起义的各路诸侯之间。为避免上海集团与武汉集团的矛盾激化，张謇提出了如此倡议。当然，他必须

① 章开沅、林增平主编《辛亥革命史》（下），东方出版中心，2010年，第1185页。

② 《赵凤昌藏札》第107册。